



# 我的学生时代和我的老师

□马西良

十遍几百遍那是常有的事。每天天还不亮,我们手里端着用墨水瓶做成的一股煤油味,回家吃早饭,鼻孔里都是黑的。上到二年级学第七课《支左爱民好模范李文忠》时,国家号召村村办小学,小学下放到村办,合过来的同学都是原来在联小上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平均比我们大三到四岁。二年级未上上三年级,我和十几位同学跳了一级,到四五年级时,由于我肯学下功夫,成绩赶了上来,每次在班级都是前一二名,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叹服。教课的老师是李来君、王永金、张子成,他们都认真负责,班级成绩也比较好。我虽然年龄小,但成绩好,老师也比较喜欢,尤其我爱看书,语文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名列前茅,每次背诵语文总是第一名,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

上初中时,我们转到五村联办的小官山小学,学校离我们村有二里多路,中间要过我们村前的小河,夏天趟着哗哗的河水,拥捧河水洗脸,沿着山边梨行走到学校。当时河上还没有桥,天凉了要从石凳上过河,有时还会摔到水里,虽然河水不深,但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不少。一到冬天,天黑得早,手里捧着煤油

灯,脚下踩着水中的石凳,左一脚右一脚,像是踩着梅花桩,稍不留神就会摔进河里。初中的两年应该是说在斗争中进行,初中正是在文革时期,学校对教育抓得不严,正是黄帅“不学ABC 照当接班人”、张铁生白卷英雄的时代,我们班主任是史中文,他代的是语文课,史老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思想活跃,提倡创新思维,重在开发学生智力,给学生自习学习的空间,尤其是他龙飞凤舞的板书,对于我这样善于动脑激进的学生来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部分年龄大的学生可不干了,他们认为老师不专心代课,领着学生观察自然给村民看病,给学生讲解生物属于不务正业,因此一呼百应,成立了战斗小组。有司令、有参谋,有武官,有文书,专门找老师的过错,联合全班同学和老师战斗,最后学生告到校长那里,集体罢免班主任。牛玉新老师接任班主任。牛老师工作严谨,管理严格,他代我们数学课,非常认真。班级秩序才好起来,教物理的是李广俊老师,化学课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张金钟老师。

初中毕业时,正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键时刻。推荐上高中,也不考试,村革委会干部、贫下

中农代表、学生家长共同召集起来,每个初中毕业生写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然后自己朗读,村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全体家长打分,最后根据上级的指标评比看谁进高中。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朗诵口才好,开完会,父亲回到家就面带笑容,说散会后好多家长、村干部都夸我写得好好。实际上初中生写这样的文章,就是看谁会云里雾里吹罢了。

1975年秋天,我和西岭、西景、西凤和李春华五个同学带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重托走进了东沙河五七中学,开始高中学习。高一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周国权,周老师是上海人,一口普通话,戴一副深度眼镜,不仅语文课讲得好,而且乒乓球亦是他的强项。他教学严谨、知识渊博、教法自然,是一位好老师,他代语文课,炉火纯青,在同学们、学校中有很好的口碑。后来,李方举、彭高群老师相继都任我的班主任和几何、物理教师,他们治学严谨,管理严格,善于和学生沟通,对我以后的成长起到很大教育作用。

严格的高中生活不到半年,又一次席卷全国的大字报之风兴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校提供笔墨纸砚,学生可

以尽情写大字报,练龙飞凤舞的书法。数理化不学,改学农机具修理,畜禽的防疫,卫生知识。学工学农到农场刨茅根、挖地瓜,男男女女捧着粪叉拾大粪,优哉游哉,学习无压力,纪律不约束。上高中年龄比较小的我,天天看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画册小说,没有闲着。虽然生活条件差,有时开水都喝不上,父亲送去的清水大蒜炒萝卜片,吃得胃疼,但天天也有乐趣。高中两年的学习对我今后爱好文学、新闻报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这可是一个惊天大喜。十年动乱结束,高中毕业的我们又回到学校学习,以备高考,这可把老师们难坏了,没有教材,缺少资料,连民国时期的数理化教材都翻出来了。老师们只好自编教材,油印卷子,学生抱着试试的心情挑灯夜战。到年前全国高考,祖孙三代一考场,十年的生源一块考。当时我报的是中考,虽然预算考上了,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又参加全镇的尖子补习班,学习九个月,奋战九个月,写了两本诗集,结果仍然没有金榜题名,从此离开了学校,结束了学校生活。

离开了学校,从事了教育工作,以及后来调到政府部门,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在理想王国里冲刺了几十年,实现了当诗人当作家的梦,获得了国家、省、市级的多次奖励,但没能实现金榜题名仍是我一生的遗憾。好在儿女争气,都考上了大学,算圆了我的大学之梦。

本版插图 张莉萍

## 婚礼变迁

□冯硕

进入新世纪,人们的婚礼越来越追逐时尚、表达个性。表妹就是这样的时尚达人,她的婚礼选择了在海边举办一场草坪婚礼。现场被一束束玫瑰花点缀得格外浪漫,白色的薄纱,粉红色的拱门,复古造型的烛台和酒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一曲《爱在蔓延中》的背景音乐中,新娘穿着白色公主裙,手捧一束百合,挽着“王子”的手臂缓缓入场。蓝天、白云、绿地,见证了一对新人步入神圣的殿堂。

新中国60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婚礼方式的变化,正是体现了不同的年代特征。

上世纪七十年代,好多农村还没有通电,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精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如果有一天村里来了说书人,平静的村落里就多了一些快乐和笑声,小小的村子像过节一样变得热闹了许多。说书的往往是一个人,背了包袱,胸前吊一面颜色变得灰暗的小鼓,惹人注目。当然,也有的说书人与自己的儿子或是妻子相伴而来。记忆中还见过说书的盲人,由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用一根棍子引领着慢慢走来。

说书人一般选择农闲时间来到村里。那时的人们都坚守在村子贫瘠的土地上,“打工”这个名词还未产生。街头上或蹲或站的总是不断人,远远地见有说书人到来,早有热心的人迎上前去,帮说书人卸下沉重的包袱,引了他到村子的中心位置去。更多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着说书人的来历。在谁的门口,那家的主人会勤快地搬了凳子,端上一杯热茶来。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帮说书人张罗下了住宿的地方——一般要住到生产队的场院里。一会儿工夫,消息就传遍了不大的村子:村里来了说书人,晚上去听书啊。说书人到来,用不着拜访村里的领导,因为一切有群众支持,完全可以拿

1974年秋的一天,我在田间劳动时突然接到大队通知,让我去公社中学报到当代课教师。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因为我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父亲被划为右派还在服刑,这种代课拿工资的“美差”按理说是轮不到我的。后来校长跟我掏了心窝子:“上面提出了‘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要求我们中学搞试点,将高中部由原来的两个班扩为四个班,这就缺师资,出身好的高中知青都选遍了,还是不够,这就想到了你这个出身虽不好但表现还不错的66届老高中生,你可要珍惜呵!”我感激地连连点头。

那时的教育重实践轻理论。教学都要结合当地实际,如讲数学则让学生用正弦定理测量山高,用余弦定理测量池塘宽度等;而化学则主讲化肥的酸碱性与合理施肥等。最让学生感兴趣的还是物理课,因为当时物理都是讲“三机一泵”,即

村长不当干部。

晚饭过后,在村子里比较宽阔的地方,人们带了凳子陆陆续续地围上来,不多会儿就坐得满——远比村支书召集开会去的人要齐整。说书人一通鼓罢,就开了腔。开场白要寒暄几句,一般少不得客套:“兄弟爷们、姊妹娘们,说书人前来贵庄,请您多多关照。”然后转入正题。说书人最喜欢说的多是《杨家将》、《岳飞传》、《呼家将》等传统书目,因为这也是人们最喜欢听的几

## 村里来了说书人

□孟凡盖

部书。故事的梗概万变不离其宗,然而经过说书人的加工修改,故事的情节却大不相同,各有各的说法。现在想来,那些穿着筒朴、相貌平平的说书人其实是有着极好的文学天赋,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给流传多年的古书增添很多新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百听不厌——据说他们中有些人竟然还不识字!说书人多才多艺,不仅会说,还会唱;敲着鼓点,中间还要穿插几声铜板。听众中不少孩子,随了大人来看热闹,对古书

## 代课生涯

□周五纯

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与农业生产联系得很紧。课堂上不但要讲“三机一泵”的机械原理,还要现场大卸八块让学生能拆能装,最后更要让学生会操作使用。

“三机一泵”中难度比较大的是驾驶手扶拖拉机。学校的操场只能用于讲解拖拉机的原理和拆卸部件,要真正学会驾驶,就得上田头去。

当时由于“读书无用论”仍然泛滥,加之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对“师道尊严”的非常事件,因而学习气氛很松懈,老师基本上不布置作业,期中期末考试大多是互相抄袭。出于报答校长的知遇之恩和自己的良知,

我还是尽力做到对每个学生负责。为了让学生能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我尽可能将书中的内容讲得生动有趣些,多用一些提问来代替作业,加深他们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并表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到我的宿舍问问题。校长对我的这种教学方法很赞赏,并暗示其他老师效仿。

1977年12月,我所教的学生中有20多个与我一同参加了高考,结果有两位学生与我一起跨进了大学的门槛。临行之际,公社特意举办了欢送会,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以及考上大学的父母们都夸我们这些教师为他们争了光,说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出了大学生,这都多亏平时我们教得好啊。听到这话,我和其他教师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掠过一丝愧疚:如果平时我们这些教师真正顶住压力,规范教学秩序,严格要求学生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再多考上几个大学生了。



“举起瓦面金铜……”说书人稍一停顿,“各位老少,不光八王有瓦面金铜,俺说书人也有瓦面金铜哪!要问说书人瓦的是什么面,俺明天要走了,不得上各家去‘瓦’些面来吗?还请各位多多原谅啊!”说完,起身抱拳,转上一圈,坐下继续说书。这个时候,大家才想起,说书人来了有几天了,是该“乞粮食”了。笑声中心里就有了抖。原本说书人不太好提的“要求”,抖上这样一个“包袱”,就变得很轻巧了。

第二天一早,说书人便拎了只袋子,各家各户地去了。一句客气话没说完,主人早就用瓢端了或多或少的粮食来:小麦、玉米、瓜子或是高粱米,往口袋里一倾——村里人虽然自己粮食不多,却不会对说书人有吝啬之心。走不过一遍,说书人的口袋也快要满了,引来村人羡慕的眼光……

听不大懂,不多时,小的孩子便偎依在大人的怀里睡着了。大一些的孩子有些耐不住,在人群中嬉闹追逐起来。说书人见状话锋一转:“正在这时,前面来了两个小和尚!”人们不解其意,说书人一声叹息:“哦,说书人看错了,原来是这两个小学生。”人群中不由发出一阵笑声,“肇事者”被大人一把拉过,屁股上狠狠打上两个巴掌,小孩子们都变得安分了许多,于是继续说书。说书人却也知趣,听人群中有了哈欠之声,便

卖个关子:“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着说。”戛然而止。于是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去,留下几个“粉丝”争着帮说书人把凳子、小鼓之类东西送到住处去。

说书人一般只会在一个村子里呆上两三天时间。只有走得村子多了,才能多得多些“报酬”。而村民们所给的“报酬”也只能是一点粮食罢了。记得一次说书之间,正讲到忠臣杨六郎遭人陷害,皇上昏庸,就要将六郎开刀问斩。“这时,八王赵德芳